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经济、政治、 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困难，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中共中央坚定地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始终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消灭了国民党残余武装，在全国大陆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外交和国防上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筹建新中国的工作。1948 年 5 月 1 日，党中央发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从 8 月开始，各有关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筹备新政协的事宜。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起草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等任务。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明确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文章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团结，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这篇文章，明确了即将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六百六十二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国外华侨等。会议决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了。”“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文教政策和军事制度。在一个时期内，《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下午两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

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构，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下午三时，北京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他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并命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局面。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面临着许多困难，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已经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一百多万正规军队，占领着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六省的一部。在解放区，国民党遗留的特务、土匪等各种残余武装还有二百多万人。这些正规军队和残余武装，还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权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对抗。1949 年 10 月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还“迁都”重庆，依托西南，负隅顽抗。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在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时，国民党遗留下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从 1937 年 6 月到 1949 年 8 月的十二年中，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由一百四十一亿元增至六千六百三十六万亿元，增加四十七万多倍。到 1949 年 5 月，又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亿倍，全国物价上涨八十五万亿倍。新中国成立后，除国民党遗留的上述问题外，由于战争开支浩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接收旧人员负担沉重（国家

负担的公教人员九百多万），百业待兴需要大量资金（特别是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而生产有限，税收制度不健全，全国财经不统一，造成入不敷出，也不得不暂时靠发票子来解决困难，加上投机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发行额如以 1948 年为基数，到 1949 年 11 月就增加了十一倍。1949 年 11 月到 1950 年 1 月，人民币发行额由二万亿元增至四十一万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同期物价上涨百分之四十。从 1949 年 8 月到 1950 年 2 月，物价上涨二十多倍。当时，国内外许多人断言共产党克服不了经济上的困难。有的人说，共产党军事打一百分，政治打八十分，经济只能打零分。

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得到了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但苏联在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还存有疑虑，在经济上其自身也很困难，对新中国的援助不可能太多。美国在其“扶蒋反共”的政策失败后，虽然一度曾幻想在疏远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条件下同新中国建立关系，使中国成为美苏之间对抗的缓冲地带，但因其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在看到 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特别是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出兵援助南朝鲜的同时，下令海军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迅速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中国的安全。

在政治上，美国不但自己拒绝承认新中国，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办法，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是很严峻的。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进入城市、掌握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过去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的警告，要党员不要因胜利而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乐的情绪。1949 年 3 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周恩来将之比做“进京赶考”，表示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脚跟，克服严重的经济等困难，便成了党中央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初登国际舞台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一边倒”，就是在分别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斗争中，明确倒向苏联一边，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以寻求苏联和东欧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支

持。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三项方针，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正如他本人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然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和三大外交方针明确写了进去。《共同纲领》指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的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或修改，或重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将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电送各国政府，建议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第二天，苏联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

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新中国在它们宣布外交承认后立即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原来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严格慎重的办法，要求它们先宣布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后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到 1950 年 10 月，已有二十五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有十七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一改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形象，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根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新中国政府在建国前后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权力的措施。收回美国、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在中国的兵营和原由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海关，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船只在中国内河的自由航行权。对于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等，分别不同情况，予以代管、征购或管制。对于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兴办的文教事业，分别采取了接管、改造等措施。对于原由外国教会操纵和影响的教会，则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这一切，有助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并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

1949 年 12 月，为了发展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处理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毛泽东率团赴苏联访问。经过努力，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两国外长并互换三个照会，声

明 1945 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失效，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的现实，决定苏联经济机关在中国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北京原苏联兵营的房产均无偿地移交给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余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用以偿付中国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设备，偿还期十年，年利为百分之一。

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建设事业，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大陆的统一

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解放全国大陆，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和西南地区挺进。

在华南，1949 年 9、10 月间，林彪、罗荣桓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主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湘粤战役，消灭白崇禧主力部队十万多人，解放城市六十余座，并解放了华南重镇广州。

在西南，11、12 月间，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歼敌十七万多人，解放了广西全境。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十八兵团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发起西南战役，歼灭胡宗南部队等七十余万人，解放了贵州、四川、云南、西康四省。其间，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

在华东，10 月，陈毅、粟裕等率领的第三野战军解放厦门，歼敌四万余人。在西北，10 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的第一兵团，在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后，进驻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12 月 31 日，党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宣布 1949 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外的全部大陆。

1950 年 4 月 16 日，第四野战军一部横渡琼州海峡，发起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4 月 30 日解放了全岛，歼敌三万余人。5 月 16 日，第三野战军一部登陆舟山本岛，19 日，解放舟山群岛。

到 1950 年 6 月，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三十万人，使整个解放战争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到八百零七万人。此外，在新解放区还歼灭国民党

土匪武装近百万人。10 月，第二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少数部队的配合下，向西藏进军，不久攻占西康的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打开了进藏的大门。1951 年 4 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5 月 23 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根据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分路进入西藏，10 月进驻拉萨。至此，全国大陆全部解放。

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政权机构。由于新解放区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强，社会秩序还不安定，一般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组织恢复生产。在条件具备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地方人民政府。1949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通则。1950 年 1 月，政务院制定了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12 月，又制定了区、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根据上述法规，各地相继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

到建国一周年时，全国已经成立了两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和华北），一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四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华东、中南、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西南），二十八个省人民政府，九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十二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九十七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二千零八十七个县人民政府。这样，各级人民政府就普遍建立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空前统

在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还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早在 1949 年 1 月，党中央就发出指示，要求对于官僚资本不要打乱原来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管理，而是把它完整地接收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由于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平稳。到 1949 年底，全国共计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二千八百五十八个，拥有职工一百二十九万人，其中包括发电厂一百三十八个，采煤、采油企业一百二十个，铁锰矿十五个，有色金属矿八十三个，炼钢厂十九个，金属加工厂五百零五个，化工厂一百零七个，造纸厂四十八个，纺织厂二百四十一个，食品企业八百四十四个。另外还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系统和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二千四百多家，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这些企业包括了官僚资本的最主要部分，没收了它们，官僚资本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没收官僚资本，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到 1949 年底，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达百分之四十一点三，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九，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国营经济还掌握着全国的铁路、大部分现代交通运输

业、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和国内外贸易。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基础。

抗美援朝和社会改革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和美国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在朝鲜北、南两方接受日军投降。后来，两方分别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双方摩擦、冲突不断，终于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内战。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在苏联缺席（抗议无理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的提案，指责北朝鲜侵略南朝鲜。 6 月 28 日，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朝鲜和中国内政。 7 月 7 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组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除美国外，参加者还有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 9 月 15 日，美军趁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集中七万五千人的兵力，在二百六十余艘舰艇和五百架飞机掩护、支援下，在西海岸仁川登陆，将人民军的补给线拦腰切断。 9 月 28 日，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平壤。在此危急形势下，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助，希望中国出兵援助。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准备。当时，一方面进行政治和外交的斗争，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和对台湾的占领，声援朝鲜人民；另一方面，军事上也进行了部署。 7 月 13 日，中央军委决定抽调十三兵团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四个军，加上一些炮兵、工兵部队共二十五万余人，组成东北

边防军，调往中朝边境。9月6日，又将五十军补入边防军序列。8月下旬，又决定将上海地区的九兵团和西北边区的十九兵团分别调至津浦线和陇海线，准备策应东北边防军。同时，中央军委还作出了加快特种兵建设的决定，并将东北南部的设备向北转移。

10月初，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朝鲜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开始，一些人不同意直接出兵，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开始，战争创伤正待医治，财政还很困难，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更处于初创阶段，要同美国直接进行较量，困难很多、很大。但是，毛泽东坚决主张出兵参战。他认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将更为猖獗，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况且，强兵压境，我国很难安心从事建设。他还分析了我国的一些有利条件：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我军一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援近便；而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是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我们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是有可能的。毛泽东也充分估计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美国直接进攻中国，至少是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纵然出现这种情况，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定，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9日，志愿军隐蔽入朝后，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敌人等作战方针，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收复了北朝鲜的

失地，并且一度将敌人追赶到了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迫使美国和南朝鲜同意进行和平谈判。此后，谈谈打打，双方前线基本处于胶着状态，直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终于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期间，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三百多万人。美国出动了它的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消耗作战物资七千三百万吨，消耗战费二百亿美元，使用了除原子弹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但却没有捞到什么便宜。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毙伤俘敌军一百零九万三千人，其中美国三十九万七千五百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四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三千零六十四辆，击毁击伤和缴获各种炮七千六百九十五门，击沉击伤军舰二百五十七艘。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先后投入兵力一百三十多万人，伤亡达三十六万余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保卫了中国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宁。从此，帝国主义国家轻易不敢进行侵略中国的冒险，我国赢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确定并实行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首先以财力物力保证战争胜利，其次是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然后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党中央还领导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志愿军，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促进了国内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还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和潜伏下来的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人，各种特务分子约六十万人，共计三百多万人。他们不断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朝鲜战争爆

发后，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1950年，他们光在新解放区就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四万多人，其中仅广西就杀害七千余人。1950年秋，他们竟然准备在国庆节时炮轰天安门。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党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到1951年10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三百万人，在大陆上基本消灭了土匪、特务、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定安。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是国家实现民主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障碍。

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斗争。到1950年6月为止，已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但还有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在全国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和政府在新解放区主要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为进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明确提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新形势的需要和问题，《土地改革法》作出了一些新的政策规定。对富农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对地主，限制了没收财产的范围，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切实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农，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的阻力，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从而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了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1950 年 7 月，政务院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 8 月，颁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11 月，颁布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为指导土改工作，县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从 1950 年冬天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工作方法上，强调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和平土改”的恩赐办法。党和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运用各种形式，动员各种力量，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工作。还动员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下乡参加或参观土改，把许多同封建剥削有联系的资本家也吸收到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来，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地主阶级，使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